

◀ (上接4版)

其骧先生,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映。通过各方面努力,复旦大学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,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在此期间,徐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,归还王师母。如上述清代王澐的《积书岩摹古帖》——这是先生生前变卖师母首饰购得者。同时,收罗先生部分遗稿,加以保存。其中包括《蛾术轩善本篋存书录》清稿本的绝大部分,共二十七册。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稿,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,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稿子,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考试,笔者有幸,忝列徐鹏师之门。在学期间,读过此稿,并遵师命,和同窗一起,编成《蛾术轩篋存善本简明目录》,油印若干,散发学友参考。

此后,徐鹏师先后整理、出版了《文献学讲义》《藏书纪事诗补正》等先生遗著。又和原复旦大学教授,后为北京图书馆(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)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一起,标点整理这部《书录》。

两位先生,不顾自身健康,放下手中著述,费时多年,方始告竣。其间,徐鹏师曾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分整理稿。

上世纪90年代,徐鹏师命笔者尽力联系,争取出版。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生支持,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辑,在2002年出版了标点整理本。徐师特命笔者撰写《前言》,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,略作说明。出版不久,初版售罄。2012年再版。

标点整理本问世,王欣夫先生的学术成就,进一步受域内外学界关注。王先生的学生,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《海上学人》等著作中,专门介绍王先生的事迹和为人。潘旭澜教授,从文化史的角度,宏观审视,发表长文《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》,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鹄先生、徐鹏师整理《书录》的情况,引起学界相当反响。其他学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文章也多见刊出。

到本世纪初,徐鹏师感觉体力和精神不支,数次和笔者谈及王先生遗稿的整理。2003年3月,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夫妇请到家中,共同决定,将遗著托付给笔者。

受命惕若,夙夕在念,不敢懈怠。多年来与各方联系,王先生和徐鹏师的遗著,已出版数种。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,这部著作,可望化身千百,流传于世。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

在天之灵。

学术有传承。学术的传承不仅为名义上的师弟关系,更反映为一种人与人的深层联系,一种精神之延续。半个多世纪,潮起潮落,人情变幻,世态炎凉。随波逐流,沽名钓誉,固然有之,而这部文稿的流传,笔者更多感受到的,是前贤对学术的执着追求,是情感交流的温暖,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,是一种人性中的真诚,此乃更值得珍惜之处。

关于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价值,笔者已在该书标本的《前言》中做了一些说明,此不重复。

那么,为什么已有整理标点本,还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?

首先,徐鹏师生前教示,已出排印本,鉴于当时社会环境和认识,个别篇目,全部删削。有些篇目,有所改动。出于出版形式的考虑,对原书分卷,稍有变易。因此,影印本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原稿的本来面貌。

其次,王先生在每篇写成之后,请人誉写。清稿成册之后,又加修改,增补、批注。这些内容,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变化,而在整理本中,则无法看出这样的过程,或反映得不明确。

最重要的,就此稿本形态的价值而言,更完全应该影印。众所周知,各种文化样式: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、电影等等,在各自发展历史上,每个阶段,都有自身标识性作品,都有自己的经典。书籍稿本的发展也是如此。

中国的典籍文本,历经甲骨、金石、简帛,纸张等载体变迁,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。典籍形态,自印刷术发明以后,多由手写转为印刷,却丝毫不减少手书稿本、抄本的价值。自19世纪末以来,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,钢笔、铅笔、圆珠笔取代了毛笔。进入电子信息时代,电脑打字又取代人工手书。在中国,用毛笔书写的稿本,越来越少。这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转折点。

这部清稿本近五千万字,一百七八十万字,全部用毛笔小楷工整写定,书法光鲜夺目,蔚然大观。作为典籍变迁、书稿形态转折点上的代表性作品,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时代意义。笔者不赞成轻率发出“某某时代没有文化巨作”的抱怨。以笔者数十年海内外跋涉,调查研究汉文典籍的经历所见,就个人著述的汉文稿本言,当今之世,鲜有可与此比肩者。

总之,无论从其内容、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角度而言,还是就其形式、从稿本流变的形态变化角度而言,这部《书录》都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之作,无愧为时代的经

典。因此,影印非常必要。

谓予不信,请拭目以待。十年、百年之后重回首,当证吾言不妄。

最后,要对在这次影印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一点说明,对贡献了力量的各方表示感谢。

首先,要感谢王欣夫先生的哲嗣王启栋先生和夫人,慨然同意并大力支持此书的影印出版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,在当前商业风潮正盛之际,表现出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见识和担当,决定影印线装出版。该社王为松总编、孙瑜主任,对此表示了热情关注和支持,尤其编辑雷雷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。

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思和馆长、王亮博士等,为翻印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两册残稿,无私地提供了方便和支持。鉴于残稿中钢笔书写的一册,除两篇在清稿本中未收录外,余皆已收入《书录》清稿,而此两篇,原非清稿,当初先生未收,殆有原因。按本书体例,亦不收录。

原稿没有目录,为便于检索,此次影印,在每页中缝,标上页码。加上了书前目录和书后的索引。其余概从原貌,不作任何修饰。索引的编制,得到吾友上海文史馆馆员金良年先生的真心支持,由他亲自编成。

尤其要感谢的,是许多和笔者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、学者,多年来,从各种角度,用不同方式,表现出对王欣夫先生和这部稿本的关注,希望尽快看到影印本问世,并为此书的出版,给予了实际的帮助。这不仅是对王先生个人,而应视作为对于中国历史典籍、对于中国文化本源的关注。使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人,感到“吾道不孤”、被人理解的温馨,也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努力,以使中华文化更加开放地与世界交流的信念。

众志成城,才是这部稿本最后得以发出光辉的根本动力。

五十年前,知名学者卢弼先生对于王欣夫先生的学术业绩颇为赞赏。称他“千金一诺重千斤”,“文章道义结知音”。并将他和清初潘耒整理顾亭林遗著相比:“同是名贤同不朽,师门谊笃重东吴。”

同辈学者吕贞白师也有诗这样评价:“蛾学斋能抱道真,三吴学派未沉沦。自从黄颍风流歇,天壤王郎第一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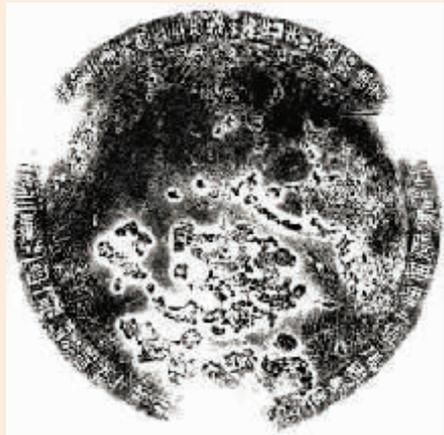
固然,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身的局限,而就对于前辈遗稿和近代文献学的贡献而言,王欣夫先生无愧此誉。

故谨借这些诗句,作为结语。

(本文为影印本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前言。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)

关于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的补正

郭永秉



汉青铜上林灯,铭文分作三段书写

拙文《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》于《文汇报》2018年3月2日第332期正式刊发。当晚在网上随意搜检,不意竟查到一件2016年12月17日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交的“汉青铜上林灯”(见雅昌艺术网:<http://auction.artron.net/paimai-art5098563090/>),不禁为自己疏于检索而感到遗憾。此灯铭文基本无损,且恰与拙文讨论的元封二年烛豆密切相关,可补苴因后者铭文磨损不清而导致的阙释和误释,故草此文以为追记,并向读者致歉。

此灯是汉代典型的行灯,“盘口微侈,平底上有钉,三兽蹄足,一侧有虎首,口中延出柄”,器物自名往往也称行烛豆、行烛薄(关于这类器物的命名及渊源,参看待刊于《史语所》《古今论衡》的拙文《〈陕西金文集成〉识小录》),其铭文今可释读如下:

府为上林铜行烛豆,容一升,重二斤半。元封二年九月乙巳,水衡小府啬夫乐成,佐满意,工渭成隐亚里上造张毋故造。

可以知道这件行灯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烛豆,是水衡小府在同一天,由同一个工匠为上林苑制作的,从字形看,二者的铭文无疑也出自一手(参看附图)。铭文以三蹄足为自然隔断,分作三段书写,显然曾经事先盘算。

“满意”是汉人常见人名(《汉印文字征》118有“王满意印”)。拙文原在佐名之下拟补一“主”字,现在看是不对的,其实应该属下补出上造张毋故的身分“工”字。至于张毋故此人所在的县里之名,拙文当时虽对所谓“阳”字写法略有疑心,但因虑及《陕西金文集成》的发表者当曾目验原器而从其释,并引李学勤先生关于“咸阳”地名的讨论作解。然而水衡小府中的一个工匠,却由一名远在云中郡的小县小里的上造千里迢迢来充任,其实也是颇为特异的,现在看到清楚的元封二年行灯铭文,疑问就豁然开解了。原来这位张毋故,来自渭成(城)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:“渭城,故咸阳,高帝元年更名新城,七年罢,属长安。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。”汉代出土文献“渭城”多写作“渭成”或“谓成”,例如汉代的“渭成令印”“渭成右尉”等印(参看赵平安《秦西汉印的文字学考察》,《康乐集》,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,第89页)及悬泉置汉简IIT0214②:556、V1412③:100等(胡平生、张德芳撰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,第5、138页。又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278.7A的所谓“渭城仓长”的“渭城”据史语所红外线图版知确是“谓城”误释,参看简牍整理小组编《居延汉简(叁)》,“中研院”史语所2016年,第203页)。因为不知“成”上一字是“渭”,故误释为“咸”;里名“隐亚”的“隐”字即原来误释的“阳”字,合于西汉篆文、古隶的典型简省写法(参看《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》,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,第1038页)。所以张毋故之籍恰是旧咸阳改名后的渭城,而非汉代的那个新咸阳,前文之解应废。渭城的改名,是元鼎三年(前114),距离制作这两件器物的元封二年(前109)已有五年左右。

我们现在可以很有根据地把元封二年烛豆的铭文释写如下:

府为上林铜烛豆(豆)一,容二升,重七斤。元封二年九月乙巳,水衡小府啬夫乐成,佐满意,工渭成隐亚里上造张毋故造。

汉代行烛与立烛豆往往配合使用(高庄汉墓有大、小立烛豆与行烛豆及豆盘同出的例子,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、鹿泉市文物保管所编著《高庄汉墓》,科学出版社2006年,页39-42),所以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同时被盗掘后流散的(所幸其中一件为公家征集),同出有无其他器物(例如烛豆的盘),还可留意。

我对新见流散文物,尤其是有铭青铜器,常感怵惕,谨慎引用,但这两件器物铭文的可靠性,无疑不存在任何问题。